

■ 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 ■

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的鉴别

卢巧琴◎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 ■

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的鉴别

| 卢巧琴◎著 |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的鉴别 / 卢巧琴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308-08479-6

I. ①东… II. ①卢… III. ①佛经—语料库—鉴别—
中国—东汉时代②佛经—语料库—鉴别—中国—魏晋南
北朝时代 IV. ①B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5261 号

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的鉴别

卢巧琴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文字编辑 胡 畔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43 千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479-6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序

2006年,巧琴入我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其时她对翻译佛经语料尚不甚了了。时隔五年,巧琴不仅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学业,续有大作《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的鉴别》问世,可喜可贺,真可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重建汉语史要有扎实的材料基础。

历史语言学的语料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方言和亲属语言的材料,这是现在的活材料;另一类是文字、文献的材料,这是反映历史发展状况的死材料。^① 翻译佛经属于后一类。

研究中古的语言,必然要用中古的语料;要想在中古汉语研究中取得突破,一是要有先进科学的方法,二是要有可靠的语料。但是“中古时期是资料使用方面特别困难的时期。一方面,经典的各种注释、史书、佛教道教的经典、诗文的别集等广泛急剧地增加;另一方面,这些资料被后世改动的也很多。如果问纯粹的六朝时期的资料是什么,一下子还不好回答。”^②理想的语料当然要充分反映各个时期口语的状况,但流传下来的历史资料中,纯粹代表某个时期口语的资料几乎没有,“在没有录音设备的时代,有声语言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想保存,就不能不靠长寿的书面语言”^③,这也就是古白话材料日益受到重视的原因。

翻译佛经无疑是中古时期的重要语料。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翻译佛经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盖因为前人在研究资料上,以先秦两汉文言典籍及后世仿古写成的典籍为“正宗”,而将一大批比较接近当时语言实际的材料,例如诗词曲、笔记小说、语录、诏令、奏状、民谣、道书、碑文、翻译佛经等,排斥在采摭征引之列;其次,翻译佛经本身是一个非常庞杂复杂的体系,疑伪经卷杂出(道安《综理众经目录》设《疑经录》,列26部30卷;僧祐《出三藏记集》列道安所出疑经,并撰《新集疑经伪撰杂录》,列疑经12部13卷、伪经8部13卷;法经《众

①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页。

② [日]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江蓝生、白维国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88页。

③ 张中行:《文言与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经目录》卷二著录疑伪经 197 部；彦琮《众经目录》卷四录疑伪经 209 部 491 卷；智昇《开元释教录》则列疑伪经 406 部 1074 卷），经中俗字异体横行，一些语词艰涩难懂，一般人不敢轻易涉足。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梁启超、吕叔湘、周一良的倡导下，特别是七八十年代李维琦、张联荣、朱庆之、蔡镜浩、董琨、俞理明、方一新、梁晓虹、曹广顺等一批语言研究者克服种种困难和偏见，重新审视、考量翻译佛经的语料价值，并且把它们作为中古汉语的研究对象，才使翻译佛经语料受到广泛的关注。

翻译佛经卷帙浩繁，数量众多，既有一定的时间跨度，也有一定的空间跨度；既有佛学专用词语，也有汉语日常用语；既有某些书面语的语体特征，又颇具口语性。因此，翻译佛经语料在时间轴、空间轴、学科轴、语体轴四个维度上都有较大的覆盖性，是中古时期不可多得的语言材料。正因为这样，在汉语史研究中，翻译佛经语料日益受到重视。在文字、音韵、训诂、词汇、语法等研究领域，均可看到翻译佛经语料的使用，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以翻译佛经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著。但总体上来说，目前尚缺乏对翻译佛经语料全面、深入的研究，鲜见以翻译佛经语料为题的专书或专文研究。同时，在对话语料的认识和利用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佛经语料的性质、特点、地位等问题的认识仍不够深入。比如，翻译佛经语料到底算是中土语料还是一种“佛教混合汉语”？^①除了口语性、宗教性这些特点之外，翻译佛经语料还有哪些特点？作为“后时语料”的翻译佛经语料，利用时存在着哪些局限？翻译佛经的文体对词汇语法有哪些影响？跟中土文献相比，语料的地位究竟如何？……这些问题尚需深入探讨。

其二，对翻译佛经语料仍缺乏全面、系统的文献整理。尽管我们已有《中华大藏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可以使用，但跟其他中土文献相比，我们的校勘、整理工作仍显不足。翻译佛经版本众多、异译屡见，再加上不明时代的疑伪经卷杂出，有些经卷显然难以直接利用，需要做大量的版本考订、文字校勘等工作，才能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爬梳出全面真实地反映语言实际、时代面貌的材料。以早期的四大译家现存译本为例，仅吕澂先生便订正出 63 部 81 卷误录之经，其他失译、疑伪的经卷更不在少数。因此，对翻译佛经语料的文献学研究仍必不可少。

其三，翻译佛经语料在汉语词汇史和汉语语法史等研究领域应用较多，如李维琦、张联荣、朱庆之、蔡镜浩、方一新等人在中古词汇研究方面广泛应用翻译佛经语料，而董琨、柳士镇、唐钰明、曹广顺则大量利用翻译佛经语料进行语

^① 朱庆之：《试论佛典翻译对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若干影响》，王云路、方一新编《中古汉语研究》（一），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125—129 页。

法研究,但在汉语史其他研究领域使用较少,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现象。作为中古时期颇具代表性的语料,其价值远远不限于为考释词汇提供书证或印证某种语法现象,它在文字、音韵、训诂、语义、语法、词典编纂等诸多方面的价值需要全面认识、多方论证、系统发掘,其应用领域仍需大力拓展。

其四,翻译佛经语料的利用存在着简单化、随意化现象。电子文本的问世使语料的检索变得更便利、更简单,但在翻译佛经语料的使用过程中,“同时语料”和“后时语料”的鉴定、核心语料与辅助语料的论证、口语语料和书面语料的区别、语料的利用原则、语料的使用方法等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仍需作进一步探讨。

其五,对翻译佛经语料缺乏一种在现代语料库语言学视角下的观照。《中国语言文字学史科学》^①是以汉语史语料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但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高著更像是“语料索引”;在对语料认识上,仍是传统的文献学视角。陈海波撰文探讨了“数据库”在古汉语研究中的应用问题^②,已经涉及汉语历史语料库建设的若干问题。但总的来说,在研究目的、研究观念、研究方法等方面仍是传统的。若借助现代的语料库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借助于计算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将会取得新的突破。比如,词汇的历时考察一向是个难题,但若借助语料库,对文本的流通度、词汇的使用度等加以统计分析,也许会取得新的成果。目前,尚未见到把语料库语言学与翻译佛经语料结合起来的成果。

巧琴的《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的鉴别》应该说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某些空白。其胜处有以下几端:

1. 选题有意义。作者选择东汉魏晋南北朝翻译佛典进行语料鉴别专题研究,洵称知难而进,有裨于中古汉语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研究价值。

2. 资料很丰富。作者用力甚勤,广泛阅读有关文献,博采前贤时修之说,董理爬梳,钩稽补阙,力图呈现这一时期语料的真实面貌。

3. 方法较科学。作者既继承了传统的文献学、训诂学研究方法,又借鉴了现代语言学理论,述故创新,历时比较与共时比较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描写与解释相结合,既有具体语料的考证,又注意把佛经语料作为整体来研究,以揭示翻译佛经语料发展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4. 本书以专章探讨语料鉴别方法——文献学鉴别、语言学考察、文化学考察、综合考辨,堪称为翻译佛经语料鉴别方法论迄今为止较好的归纳总结,尤其是关于译经年代、译人、翻译地点的综合考辨,具有示范意义;其论述译经区域划分的语言学依据和语言学意义,颇有见地。

① 高小方:《中国语言文字学史科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陈海波:《关于数据库在古汉语研究中的应用》,《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3期。

5. 作者抉发中古新词、新义,指认方言俗语,时见功力,如“平事”条释为“民间纠纷、民事诉讼的裁决者或调解人”,并引号称高昌历史资料库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佐证,结论可信;“宕”条先排比经中用例,次以他经相近异文为证,而使结论不拔,兹不枚举。本文所释字词,可供《汉语大字典》订补,或可提前例证,或可补足例证,或可订正释义,或可增补新字,具有应用价值。

诚如作者所言:“语料鉴别本身就是一种自成体系的语言研究,鉴别过程触及词汇、语法、语音的方方面面,各种标准的把握、语料比勘时纵向演变规律的提取及横向差异的拿捏,能提供更加清晰的语言发展线索;同时,各种鉴别方法的形成,有助于构建完整、系统的语言研究方法体系。”

概而言之,本书在翻译佛经语料的诸多问题的论述上都中肯且不乏新意。虽然一些观点未必全部正确,一些内容还略嫌单薄,但重要的是,它能启发我们深入思考。

是为序。

颜洽茂

2011年2月

凡 例

1. 文中所引的佛经例句皆出自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编纂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正藏》),格式为:Txxnyyyyopzzzcll。

T:表示《大正藏》(*Taisho*)经文。

xx:二位数,表示《大正藏》册别。

n:固定不变,表示后面接经号。

yyyy:四位数,表示《大正藏》经号。

o:大写之 A、B……表示《大正藏》有记载之同经号之别本,小写之 a、b……表示《大正藏》没有记载之同经号之别本,完全没有同经号资料者,用下底线符号填入‘_’。

p:固定不变,表示后面接页码。

zzzz:四位数,表示《大正藏》页码。

c:表示第几栏,a表示上栏,b表示中栏,c表示下栏,d表示校勘栏。

ll:二位数,表示在该栏的行数。

例如:T10n0279_p0001a01,即表示《大正藏》第十册 0279 经第一页上栏第一行。

2. 未出注的均指高丽本,其他版本均具体标出,如宋、元、明本等。版本略符如下:

宋本:南宋思溪藏本

元本:元大普宁寺藏本

明本:明方册藏本

丽本:高丽海印寺本

丽乙:丽本别刷

圣本:正仓院圣语藏本(天平写经)

圣乙本:正仓院圣语藏本别写

石本:石山寺本

醍本:醍醐寺本

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的鉴别

知本:知恩院本

宫本:宫内省图书寮本

和本:仁和寺藏本

东本:东大寺本

中本:中村不折氏藏本

久本:久原文库本

森本:森田清太郎氏藏本

缩本:缩刷本

金本:金刚藏本

高本:高野本

目 录

第 1 章 绪 论	1
1.1 选题缘由	1
1.1.1 译经语料鉴别研究的现状	2
1.1.2 译经语料鉴别研究的目的	3
1.2 研究材料	4
1.3 研究方法	5
1.3.1 历时比较与共时比较相结合	6
1.3.2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	6
1.3.3 描写与解释相结合	6
第 2 章 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引用时的几个问题	7
2.1 轻信题署	7
2.2 忽略版本异文	9
2.3 轻信不当断句	11
第 3 章 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的价值	13
3.1 词汇学价值	13
3.1.1 译经语料加速了汉语双音化的进程	13
3.1.1.1 “澡”的双音化情况	14
3.1.1.2 “沐”的双音化情况	14
3.1.1.3 “浴”的双音化情况	15
3.1.2 译经语料拓展了词的本义辖域	16
3.1.2.1 “洗”侵入“澡”的本义辖域	16
3.1.2.2 “洗”侵入“沐”的本义辖域	18
3.1.2.3 “洗”侵入“浴”的本义辖域	19
3.1.3 译经语料富含新词新义	20

3.1.4 译经语料有助于揭示词义的由来	22
3.2 文字学价值	25
3.2.1 出现了大量俗字	25
3.2.2 有利于厘清正、俗字的语用差异	30
3.2.3 为字书、韵书提供确切释义	35
3.3 辞书编纂学价值	37
3.3.1 可纠《汉语大字典》释义不当	37
3.3.2 可提供恰当例证	41
3.3.2.1 可补充例证	41
3.3.2.2 可提前首见例时间	56
第4章 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鉴别的主要方面	63
4.1 译经年代的鉴别	63
4.1.1 译经语料的历时性差异	63
4.1.2 译经年代鉴别的必要	64
4.2 译人的考辨	66
4.2.1 译者的个人风格	66
4.2.2 译人误题情况	68
4.3 翻译地点的考证	69
4.3.1 译经区域的划分	69
4.3.2 译经区域划分的语言学依据	69
4.3.3 译经区域划分的语言学意义	71
4.3.4 译经语料的区域属性	73
4.3.4.1 关外译经语料区域属性	74
4.3.4.2 关内译经语料区域属性	77
第5章 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鉴别方法	83
5.1 文献学鉴别	83
5.1.1 利用佛教典籍中的记载	83
5.1.1.1 利用译经前序、后跋	83
5.1.1.2 利用僧传、尼传	84
5.1.2 利用经录鉴别	85
5.2 语言学考察	86
5.2.1 语音方面的鉴别	86

5.2.2	词汇方面的鉴别	87
5.2.3	语法方面的鉴别	87
5.2.4	文字学方面的考察	88
5.2.5	文体结构方面的鉴别	89
5.2.5.1	字词平面的风格	89
5.2.5.2	篇章结构层面的风格	91
5.2.6	词汇、语法等相结合	92
5.2.7	语言比较的方法	93
5.3	文化学考察	94
5.3.1	语言研究、文化研究相互交融	94
5.3.2	文化现象是语料鉴别的佐证	95
5.3.2.1	文化现象用于鉴别语料年代的可能	95
5.3.2.2	文化现象用于考证翻译地点的可能	96
5.3.3	佛教文化是译经语料鉴别的独特佐证	96
5.3.3.1	佛教称谓	98
5.3.3.2	居住修行场所	98
5.3.3.3	僧徒用物	99
5.4	综合考辨	101
5.4.1	译经年代的综合考辨——以《昙无德羯磨》为例	101
5.4.1.1	文献学考察	101
5.4.1.2	词汇学考察	103
5.4.1.3	文化学佐证	110
5.4.1.4	语料比勘	112
5.4.2	译人的综合考辨——以《五阴譬喻经》为例	117
5.4.2.1	文献学考察	117
5.4.2.2	词汇学考证	118
5.4.3	翻译地点的综合考证——以《撰集百缘经》为例	131
5.4.3.1	语言学考察	132
5.4.3.2	文化学考证	139
第 6 章	译经语料鉴别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145
6.1	参照译经的选择	145
6.2	比较方向的确立	147
6.3	区别性语料的提取	149

东汉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的鉴别

6.3.1 区别性语料的纵向提取	150
6.3.2 区别性语料的横向提取	151
6.4 考证方法的应用	154
6.4.1 文献学考证方法的局限	154
6.4.2 语言学考证方法的局限	155
6.4.3 文化学考证方法的局限	156
6.4.4 其他考证方法的局限	156
附 录	
附录一 已作语言学考察的失译、误题之经	158
附录二 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异译经	161
附录三 见存的历代佛经目录	163
参考文献	164
后 记	178

第1章 绪论

1.1 选题缘由

东汉魏晋南北朝是汉语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翻译佛经是此时期最重要的材料之一。佛经卷帙浩繁,数量众多,既有一定的时间跨度,也有一定的空间跨度;既有佛学专用词语,也有汉语日常用语;既有某些书面语的语体特征,又颇具口语性。因此,东汉魏晋南北朝翻译佛经语料在时间轴、空间轴、学科轴、语体轴四个维度上都有较大的覆盖性,是中古时期不可多得的语言材料。

在汉语史研究中,东汉魏晋南北朝翻译佛经语料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文字、音韵、训诂、词汇、语法、大型辞书编撰等研究领域,均可看到东汉魏晋南北朝翻译佛经语料被日见频繁地使用,出现了一些专门以翻译佛经语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文与专著,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集中于语词考释及词汇的共时与历时研究,如李维琦《佛经词语汇释》^①、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②等;二是致力于翻译佛经语料的语法研究,如龙国富《姚秦译经助词研究》^③、凌敏《〈百喻经〉动词研究》^④、时良兵《支谦译经副词研究》^⑤、刘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助动词研究》^⑥、石琳《三国佛经中的双宾句式》^⑦等;三是作比较研究,包括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土文献进行比较,如胡敕瑞《〈论衡〉与东汉佛典词语比

① 李维琦:《佛经词语汇释》,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天津出版社1992年版。

③ 龙国富:《姚秦译经助词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 凌敏:《〈百喻经〉动词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⑤ 时良兵:《支谦译经副词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⑥ 刘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助动词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⑦ 石琳:《三国佛经中的双宾句式》,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较研究》^①、陈秀兰《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语言比较研究》^②、汪维辉《〈百喻经〉与〈世说新语〉词汇比较研究》^③。朱力的《〈太平经〉与东汉佛经判断句比较研究》^④则是从语法的角度将译经语料与道教典籍进行比较的。另外也包括译经自身的比较即同经异译的比勘研究,如汪祎《中古同经异译佛典词汇比较研究——以竺法护和鸠摩罗什译经为例》^⑤、熊娟《中古同经异译佛典词汇研究——以〈梵天所问经〉异译三经为例》^⑥等。这些成果都是致力于对翻译佛经语料本身的研究。

1.1.1 译经语料鉴别研究的现状

随着翻译佛经语料越来越多地被引用,随着学界越来越关注对翻译佛经语料本身系统的研究,翻译佛经语料引用时存在的轻信题署、忽略版本异文、轻信不当断句等三个问题也日益突显出来。

同时,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翻译佛经又是个非常庞杂的体系,翻译年代、译者、翻译地点不确切甚至被自相矛盾地记载的译经大量存在。这些年代、译者、翻译地点尤其是年代、译者不确切的译经语料未经鉴别就被直接引用,导致研究结论受影响的情况在当下的汉语史研究中并不鲜见。

对这些失译语料的鉴别,早在20世纪80年代,吕澂、许理和先生已从文献学、佛教思想等视角切入进行研究。90年代,失译语料的语言学鉴别初露端倪,遇笑容、曹广顺、汪维辉、颜洽茂、梁晓虹、史光辉、季琴、熊娟等均有零星考证。方一新先生在结合文献的基础上,主要从词汇、语法或词汇、语法相结合的角度,对具体的失译、误题之经如《大方便佛报恩经》^⑦、《分别功德论》^⑧、《兴起行经》^⑨等进行了考证。在具体的考证过程中,方氏不仅逐渐提炼了各种鉴别方法,指出了鉴别过程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同时也归纳了“普通鉴别词的提取及

① 胡敦瑞:《〈论衡〉与东汉佛典词语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版。

② 陈秀兰:《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语言比较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

③ 汪维辉:《〈百喻经〉与〈世说新语〉词汇比较研究》,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汉语史学报》(第十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④ 朱力:《〈太平经〉与东汉佛经判断句比较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⑤ 汪祎:《中古同经异译佛典词汇比较研究——以竺法护和鸠摩罗什译经为例》,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⑥ 熊娟:《中古同经异译佛典词汇研究——以〈梵天所问经〉异译三经为例》,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⑦ 方一新:《翻译佛经语料年代的语言学考察——以〈大方便佛报恩经〉为例》,《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

⑧ 方一新:《〈分别功德论〉翻译年代初探》,《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⑨ 方一新:《〈兴起行经〉翻译年代初探》,《中国语言学报》2003年第11期。

原则”^①，为大量的年代、译人仍未确切的失译、误题之经的考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2 译经语料鉴别研究的目的

“在语言的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是资料的选择。资料选择得怎样，对研究的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②，太田辰夫先生这一精到的见解，说明了研究者对语料抉择的重视。理想的语料首先离不开真实，语料准确是立论的前提，是汉语史研究的根本，离开这一出发点，任何研究都将是空中楼阁。

汉译佛经以数量宏丰、口语性强而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古时期弥足珍贵的语料，但译经本身却是个非常庞杂的体系，“译师来自西域，汉语既不甚了解，笔受之人，语学与教理两皆未娴，讹谬浅薄，在所难免”^③，加上很多经本身就未作注，道安编撰目录时，已有“一百有三十四经，莫详其人”^④，僧祐有感于“年代人名，莫有铨贯，岁月逾迈，本源将没，后生疑惑，奚所取明？”^⑤而编撰目录，并特立“失译经”录之。后人未经正确考订，就臆断这类失译经或缺本新得之经出自某家，以致误题。失译经与误题经，两者名虽有异，究其实质，当同为译人、年代尚未确切者，故合而称为“失译、误题之经”。至唐道宣，这些“失译、误题之经”已达451部，717卷，而东汉至宋，汉文佛典总数亦不过2148部，8726卷^⑥。

失译、误题之经富含罕见于中土文献的方俗俚语，语言学价值极高，数量宏丰。虽已有吕澂先生主要从佛教著录的角度对63部81卷失译、误题之经作了考察，方一新等亦已对十几部如《大方便佛报恩经》、《分别功德论》作了语言学的考证，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但相对于比例如此之高的失译、误题之经，实乃沧海一粟。如为确保结论万无一失，对失译经彻底封杀，一概弃之不用，很多模糊但极具价值的语料就会因此而永沉历史长河，中古语料尤其是口语性强的材料将更加有限，我们也无以明确各时期译经语言的真实面貌，无以明确各个译人真实的独有风格，汉语史研究的客观性、完整性无疑会受到影响。

目前学界对失译、误题之经仍局限于个别考证，这在起步阶段是必不可少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应通过对具体经的考证来揭示失译、误题之经的语言

① 方一新：《普通鉴别词的提取及原则——以早期汉译佛经鉴别为中心》，《语文研究》2009年第2期，第8—16页。

② [日]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页。

③ 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④ （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8页。

⑤ （梁）僧祐：《出三藏记集》，第2页。

⑥ 此数字摘自于董志翘：《21世纪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随想》，《中古近代汉语探微》，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页。

面貌和特点,探索隐藏其后的规律。对失译语料的鉴别,不仅可为汉语史研究提供翔实、可靠的语料,为全面了解和正确使用这一时期的翻译佛经语料提供重要参照,而且语料鉴别本身就是一种自成体系的语言研究^①,鉴别过程触及词汇、语法、语音的方方面面,各种标准的把握、语料比勘时纵向演变规律的提取及横向差异的拿捏,能提供更加清晰的语言发展线索;同时,各种鉴别方法的形成,有助于构建完整、系统的语言研究方法体系。起步于具体考证的语料鉴别研究不能仅局限于个别的考证而被视为是对语言研究可有可无的补缺,它本身也应成为语言研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语料鉴别研究应与译经语言本身系统的研究相辅相成,以改变目前集中于大量引用译经语料,集中于通过对译经语料作专人断代的研究来挖掘译经语料不同于传统典籍的独特价值,却忽略了对译经语料自身基本的甄别、整理所造成的畸轻畸重的局面,这对系统的汉语史的建构并无一利。

1.2 研究材料

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②汉译佛经是新世纪汉语史研究的重要材料,随着译经语言学价值被越来越多的挖掘,其研究范围和视野也在不断扩大。但在译经语料被广泛引用的同时,语料被疏于鉴别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本文主要以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失译佛典为鉴别对象,则是鉴于以下考虑:

一、东汉魏晋南北朝翻译佛经跨越译经的草创期与发展成熟期,可为译经语料的演变发展提供语言线索。译经语料其实就是“西域僧人学习汉语过程中不同阶段的记录”^③,虽然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母语的干扰,这种干扰的强弱、多寡,会因人而异,随时间而变,译经语料作为这样的一种中介语,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语言现象,不同译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用语风格。这种属于不同年代、译者特殊的语言现象,和汉化程度紧密相连。初期译经汉化程度浅,译经语料总体偏于尚质,音译词较多;两晋以后隋以前译人的语言风格虽已臻于成熟,不过口语性仍较强,对经典的重译已蔚然成风。此时期的译经语料

① 胡敫瑞:《中古汉语语料鉴别述要》,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汉语史学报》(第五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页。

②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6页。

③ 遇笑容:《试说汉译佛经的语言性质》,中国社科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部编《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6页。